

2015年西藏山南琼结河流域考古调查简报*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

内容摘要：2015年7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组成调查团队，对西藏中部琼结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西藏中部地区的历次文物普查基本掌握了该区域不可移动文物的分布情况，但调查不够系统也不见针对研究课题设计调查方案的实例。本次采用拉网式的调查方法，旨在摸清琼结河流域史前遗址的分布情况。调查发现了若干墓葬、岩画，并探索了适合西藏中部地区的系统调查方法，为未来雅砻河谷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一、调查回顾

西藏自治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相对隔绝的文化环境，导致该区考古调查开展时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GIS支持下的西藏大遗址研究——以藏王陵为例（13YJC78000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藏王陵考古调查资料的综合研究（14JJD780001）”资助。

间相对中原地区较晚。整体来看,西藏考古调查以1951年和平解放为界,可粗分为两个阶段。和平解放以前,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主要由外国学者进行。20世纪20年代由俄籍学者罗列赫(N.Roerich)带领的中亚考古团队对西藏中部和藏北高原做了考古调查,研究对象集中在石丘墓及大石遗迹上,也对动物纹样进行了简单探讨。罗列赫将石丘墓分为三类,并从文化因素角度指出西藏与中亚及黄河上游地区具有一定的联系¹。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意籍学者杜齐(Giuseppe Tucci)带领的考古队在西藏中、西部组织了多次田野考古调查,并出版了影响颇大的《西藏考古》²。他们将西藏与中亚、南亚及中国西北地区相联系的视野,在当下的西藏考古研究中仍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此阶段的其余调查者则多关注宗教艺术,而非考古遗存。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的工作较零散,调查缺乏系统规划,材料的发现多具偶然性。

和平解放后,国内学者打开了西藏考古工作新局面,西藏中部的考古调查也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展开,霍巍、王启龙等学者对前三次文物普查成果做过详细的介绍³,此不赘述。普查成果大致反映了西藏中部的历史文化面貌,对各阶段的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07—2011年,全区进行了第三次文物普查,此次普查成果尚未发表,调查主要由区内工作人员承担,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先在拉萨和林芝地区以“拉网式”的方式进行试点调查,成效明显,该区域由原来的30余处文物点增加到400余处。此后全区的其他地方文物工作者采取类似办法在各地区开展全面考古调查,最后西藏自治区共公布了4000余处文物点⁴。但由于各地区的调查力度不等,部分地区调查仍不够系统。

总体来说,囿于时代条件的局限,西藏地区前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西藏中部部分区域的考古调查仍有部分空白,给未来工作留下了较大的补充空间,且该区域不见针对专门研究课题设计调查方案的实例。此次工作即希望通过全覆盖式调查,掌握琼结河流域史前遗址的分布概况。但由于高原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实践过程中调查团队不得不尝试不同的方法,以摸索适合西藏中部地区的考古调查方法。

1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9):9-19。

2 甲央、霍巍:《20世纪西藏考古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1(6):3-13。

3 霍巍:《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之举与历史性转折——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西藏大学学报》,2008(1):18-24。王启龙、阴海燕:《60年藏区文物考古研究成就及其走向(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1):38-49。

4 具体资料尚未公布,承蒙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陈祖军研究员通信告知,特致谢忱!

二、自然地理环境

琼结县位于山南地区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雅鲁藏布江南侧，东经 91°22'-91°47'，北纬 28°49'-29°13'。琼结河谷属于深切高山宽谷地貌。雨水侵蚀作用强，地表多形成冲积、洪积扇。县内地形起伏较大，导致土壤植被的垂直分异明显：潮土主要出现在平坦的宽谷低阶地，适农耕；灌丛草原土的植被以矮灌木和旱生草本为主，人畜活动频繁；高山草甸区多在海拔 4000 米以上，气候寒冷温润。县内主要河流为琼结河，从东南流向西北于乃东县汇入雅砻河⁵，全长 23.46 公里，宽约 15-25 米，易于农业灌溉。

青藏高原地区古气候研究早已开展⁶。资料显示，在 4.0 kaBP 前后，青藏高原年均气温较全新世中期突降 1℃ 以上；4.0 kaBP 之后，青藏高原全新世大暖期基本结束，进入了向干冷趋势发展的晚全新世；4.0-3.0kaBP 前后，气温稍有回升；2kaBP 前后，高原地区开始进入历史时期，该期气候研究较为薄弱。公元 6 世纪中叶，降水量丰沛⁷、气候温暖⁸，此期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吐蕃部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三、调查目的及方法

西藏史前考古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文化序列的构建和细化，区内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联系，西藏与我国西北地区以及南亚、中亚等地的交流及史前人类的生业模式，等等。西部阿里地区的调查和发掘无疑为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⁹，但西藏内部各史前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尚不清楚。本次调查区域选在西藏中部的琼结河流域，主要原因如下：一，该区地处中部，可能是藏东和藏西文化的交汇处；二，该区系宜居地域，史前遗存相对较多，且历次普查尚未对史前遗址做全面调查，有发现新的遗址的可能，对该区的深入研究有望构建和细化史前文化序列以及时空框架；三，该区自然条件宜农耕，当地村民现在以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为主，可能为西藏史前的生业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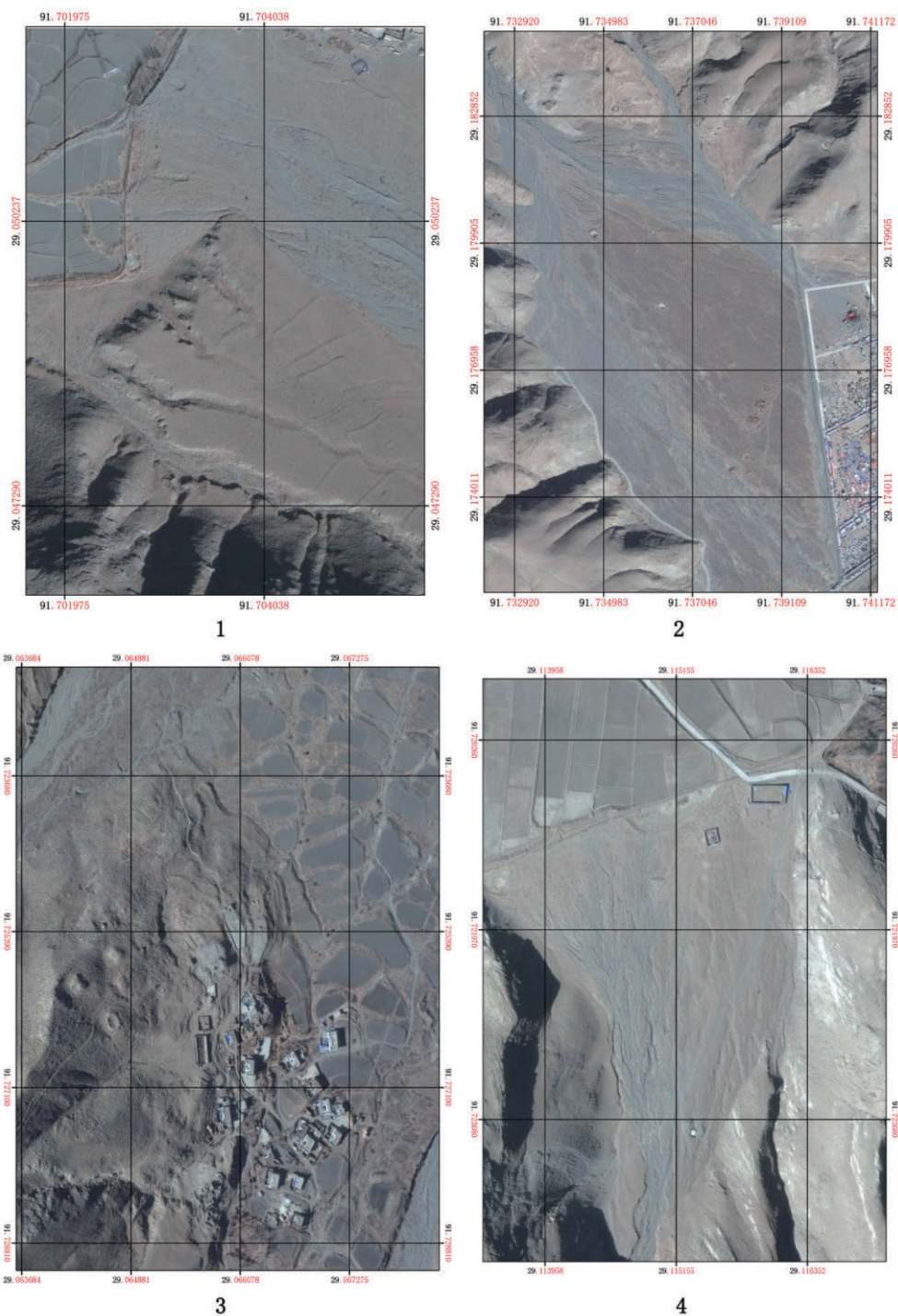
5 琼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琼结县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1-52。

6 姚檀栋，L. G. Thompson：《敦德冰芯记录与过去 5ka 温度变化》，《中国科学：化学生命科学》，1992 (10)：1089-1093。

7 邵雪梅、梁尔源、黄磊等：《柴达木盆地东北部过去 1437a 的降水变化重建》，《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 (3)：122-126。

8 Q Ge, J Zheng X Fang, et al., Winter Half-Year Temperature Reconstruction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Holocene*, 2003 (6): 933-940.

9 霍巍、李永宪：《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 年 10 月 15 日 001 版。



图一 调查洪积扇区域部分卫星图片，红色圈处为疑似遗迹区
(1. 德巴尼村 2. 赞塘 3. 欧姆村 4. 唐布齐村)

及农业研究提供线索；三，该区分布众多吐蕃墓葬，开展此区吐蕃墓的复查，对于吐蕃墓葬的认识有一定意义。

近年来，区域系统调查在国内推广度较大，与文物普查不同，区域系统调查更强调系统性。国内区域系统调查的开展多集中在中原地区，高海拔地区的系统调查经验缺乏，只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调查方案。此次调查工作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系组成的联合调查队共同完成，调查周期为半个月。调查以行政乡为单位展开，自河流上游的德巴尼村到下游的错杰村，共调查了 18 处洪积扇。之所以选择山间洪积扇作为调查区域，是因为琼结河流域整体地形由山地和山间洪积扇组成，山地坡度大，并不适合定居，今天的村庄也多分布在洪积扇内。考虑到此次调查区域的面积较大，加上西藏遗址密度小，直接踏查具有盲目性，所以在调查前我们参考了 Google Earth 30 米精度的卫星地图，在兼顾系统性的前提下，提前制定好调查方案，对疑似遗迹区域进行重点调查（图一）。地面踏查时，各成员间间隔一定距离，在较开阔的区域，调查人员尽量以“之”字形路线来横跨整个区域，在可视域较弱的农田，则各自负责一块调查区域，彼此保持密切的沟通合作。考虑到之前邦嘎遗址发现于冲击沟的断面，故此次调查人员对自然的或者人为的剖面观察得极为仔细，并对发现的所有遗存点进行了 GPS 定点测绘、拍照和初步的测量、描述，同时也有针对性地采集了一些陶片。

四、调查成果

此次调查并未发现明确的史前遗迹点，调查成果主要为历史时期遗存，包括：11 座封土墓（7 座为新发现）、3 座石丘墓、5 处岩画点及部分采集陶片（图二）。以下对各类遗存资料进行简要公布并谈一谈我们的初步认识。

A、墓葬

此次发现的墓葬按照其建筑方式和形制可分为封土墓（吐蕃墓）和石丘墓两种。此前研究基本将西藏中部所见的中型封土墓称为吐蕃墓，这次调查并未对封土墓进行发掘，所以难以对墓葬形制和时代问题有深入的讨论，仅能停留在对外形及尺寸的描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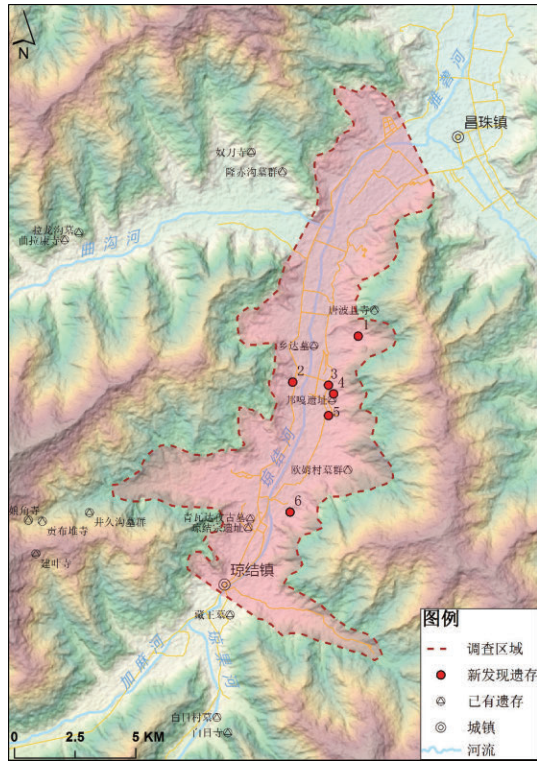
此次发现的 11 座封土墓，主要分布在欧姆村（5 处）、唐布奇村（5 处）、昆门村（1 处）。其中欧姆村有 4 处封土墓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物普查就已发现，《琼结县文物志》对此有详细记载¹⁰，四墓体积相差不大，彼此间距约在 18 米左右，相比 80 年代测量数据，

10 索明旺堆：《琼结县文物志》，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资料，1986：3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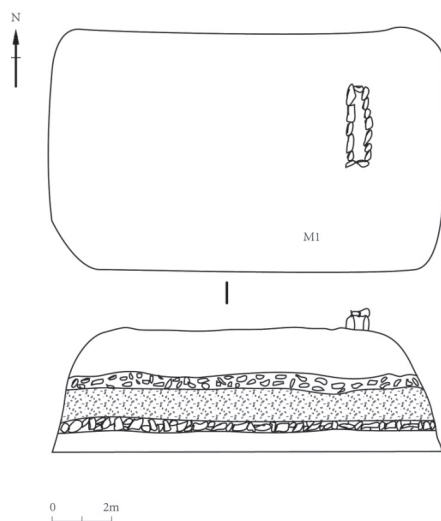
此次测量的墓葬数据偏小，可能是由于风雨侵蚀所致，此次所测墓葬平均长约 14 米、宽约 8 米、高约 3.5 米。墓葬平面略成圆角长方形或梯形，侧面多呈梯形。M1 顶部有矩形石框，从其侧面可观察到墓葬规则的分层，从地表往上的五层分别为：土层、页岩层、土夹碎石块层、碎石块层、土夹碎石块层（图三）。其余三座墓分层不明显，多为土石混合堆砌。文物普查研究者通过类比隆赤沟墓群的构建方式将此地墓葬年代定在吐蕃晚期以后。

此次新发现 M5，M5 相对前四座墓海拔较低，墓葬整体被压在现代石构建筑之下（图四），其上的现代建筑长 13.59 米、宽 8.56 米，村民取土使 M5 露出石墙（图五），墙体以土夹杂石块及碎陶片混合构建，因地面建筑遮盖，M5 的平剖面形状皆难判定。但从墙体的构建，可见 M5 规模宏大，非欧姆村此前发现的墓葬所能比拟。

另一处较集中的封土墓群发现于唐布齐村南侧的洪积扇内（图六），五座墓葬均为土石混合堆砌，平面多呈圆角长方形或梯形，侧面多呈梯形，体积整体较欧姆村墓葬偏小。五座墓由公路向山前依次排列，其中 M1 最近公路，长 8.4 米、宽 3.6 米、高 1 米。其后为 M2，该墓被



图二 2015 年琼结河流域调查成果分布图
(1.唐布奇村墓群 2.错杰岩画 3.昆门村墓葬 4.昆门村岩画 5.邦嘎村南岩画 6.德巴尼村墓群)



图三 欧姆村 M1 俯视图及侧视图



图四 欧姆村 M5 远视图



图五 欧姆村 M5 裸露墙体

破坏，残长 7.6 米、残宽 3.6 米、残高约 0.5 米。M3、M4 基本排列在一条直线上，M3，长 9.4 米、宽 4.5 米、高 1.5 米，M4 顶部有很大的圆坑盗洞，M4 长 10.3 米、宽 5.6 米、高 2 米。M5 距山坡最近长 10.0 米、宽 4.2 米、高约 1 米。

昆门村封土墓平面呈圆角方形，体积较小，长 4.4 米、宽 3.9 米、高 0.8 米（图七）。墓葬以石块砌边框，中间由石块垒筑，无夯筑痕迹。

德巴尼村背后的洪积扇中部发现了三座石丘墓（图八），三墓均呈不规整矩形，体积均较小，M1、M2 并筑，M1 长 3 米、宽 2 米、高 0.8 米。M2 被破坏，长 2 米、宽 1.7 米、残高 0.3 米。M3 位于 M1、M2 的东北方向，长 3.6 米、宽 1.7 米、高 0.5 米。通过被破坏的 M2 可看出此类墓葬的构建方式：先于地面挖矩形墓坑（深约 0.3 米），再



图六 唐布奇村墓群



图七 昆门村墓葬



图八 德巴尼村石丘墓群



图九 德巴尼村 M2

在墓坑四周垒砌石块加固，中间以土石混合物填埋，最后堆石块封顶（图九）。

此前石丘墓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藏北地区，西藏中部首次发现石丘墓，罗列赫将藏北的石丘墓及列石遗迹分为前后相继的三型，此次调查的石丘墓单从形制上看符合第三型“墓周围有石圆圈，墓冢顶端有石堆，其时代为公元七至八世纪。”¹¹ 鉴于目前石丘墓的研究尚不系统，因此笔者并不能为这三座石丘墓断定年代，仅能确定这是琼结河流域有别于封土墓（吐蕃墓）的一种新的墓葬形制，更深入的研究需要新材料的支撑。

B、岩画

历年来西藏发现的岩画已多达 60 余处，其分布区域几乎遍及整个高原¹²。山南地区贡嘎县昌果沟乡多吉扎山岩脚上曾在 1991 年发现过 40 余幅岩画，多为动物和各种人物活动¹³。此次在琼结河流域的岩画发现填补了雅江中游地区岩画的空白。本次主要发现的 3 处岩画 8 幅图像，每一单位画幅，一般长 10-50 厘米，高 10-40 厘米。岩画点相互间直线距离不超过 2 公里。所有岩画都是凿刻于洪积扇面上的巨大砾石表面之上，属于学者们总结的旷野大石岩画遗存类型。该类型原多见于藏西、北，以藏北加林山、藏西日土县阿垄沟和藏西改则岩画点为代表，岩画图像以动物、人物活动为主¹⁴。相较于上述地点，本区域所发现的岩画图像难以识别，随意性强，无明显的动物形象出现。邦噶村南岩画以凿刻的几何纹组合为主，出现了雍仲符号“卍”（图一〇：5）。昆门村岩画点，直线距离距邦噶村南岩画点 920 米，位于昆门村洪积扇上。岩画内容以几何纹为主，出现有类似树枝状图案（图一〇：8）。错杰村岩画点位于 3 处岩画点的最北面，距琼结河直线距离只有 468 米。岩画图案初步分析为宗教宝瓶状符号，上为两个“∞”型图案，右为几何线条组合图案。根据这些岩画中出现的雍仲符号、宝瓶状符合，初步推断其年代属于吐蕃时期。

C、采集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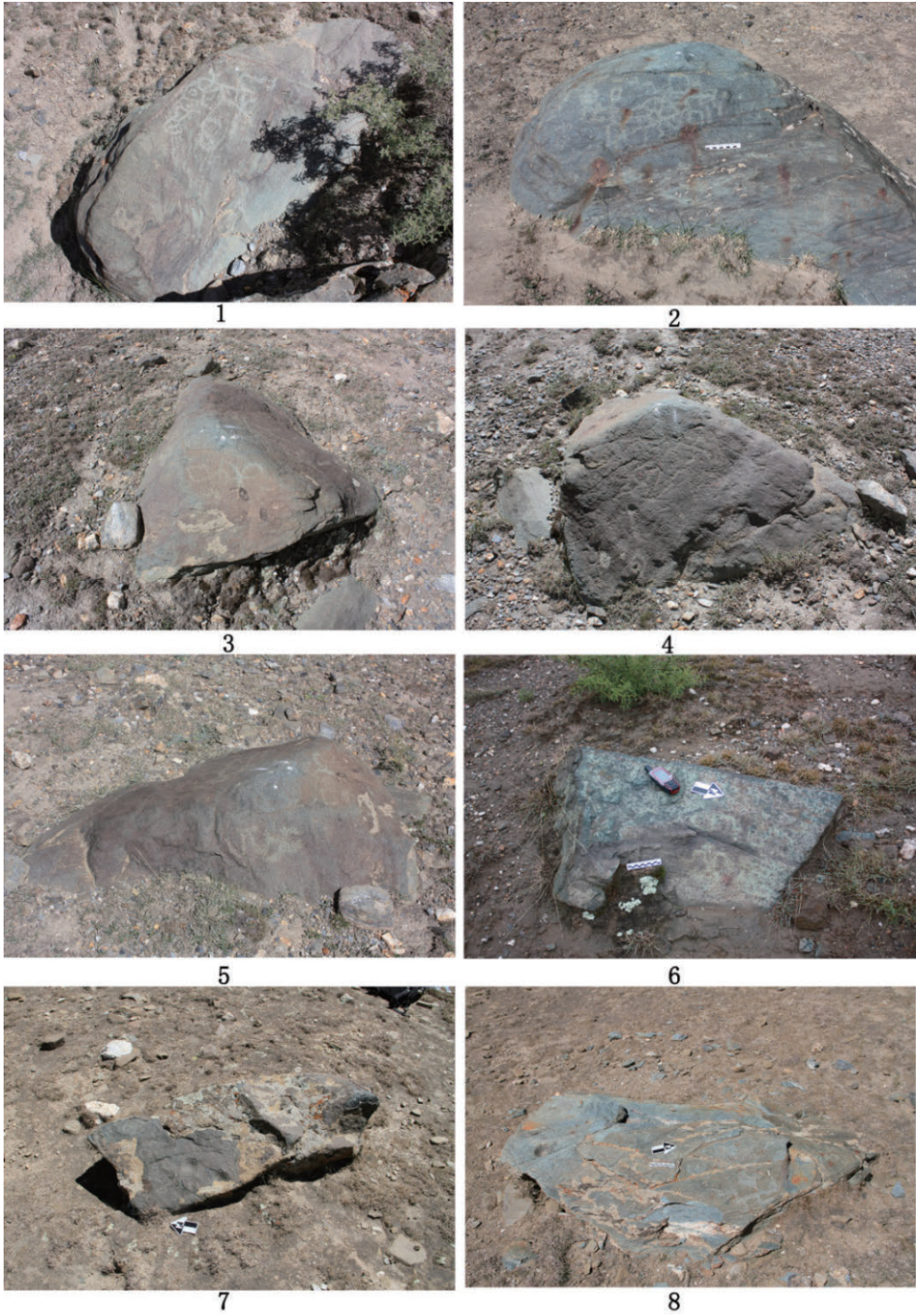
本次调查共在 5 处文物点的地表、墓葬填土内采集了陶片（德巴尼村、欧姆村 M5、邦噶村北、昆门村、唐布奇村），共采集陶片 97 块，其中大部分为夹细砂红褐陶（50 片），少量为夹粗砂陶（19 片）。此次调查并未采集到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陶片。地表采集陶片时代难断，但其特征与现代陶片有一定相似性，判断其年代可能较晚。其中可识别的标本仅 6 件（图一一），仅欧姆村 M5（暂定为吐蕃墓）填土内采集的 4 块陶片年

11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9）：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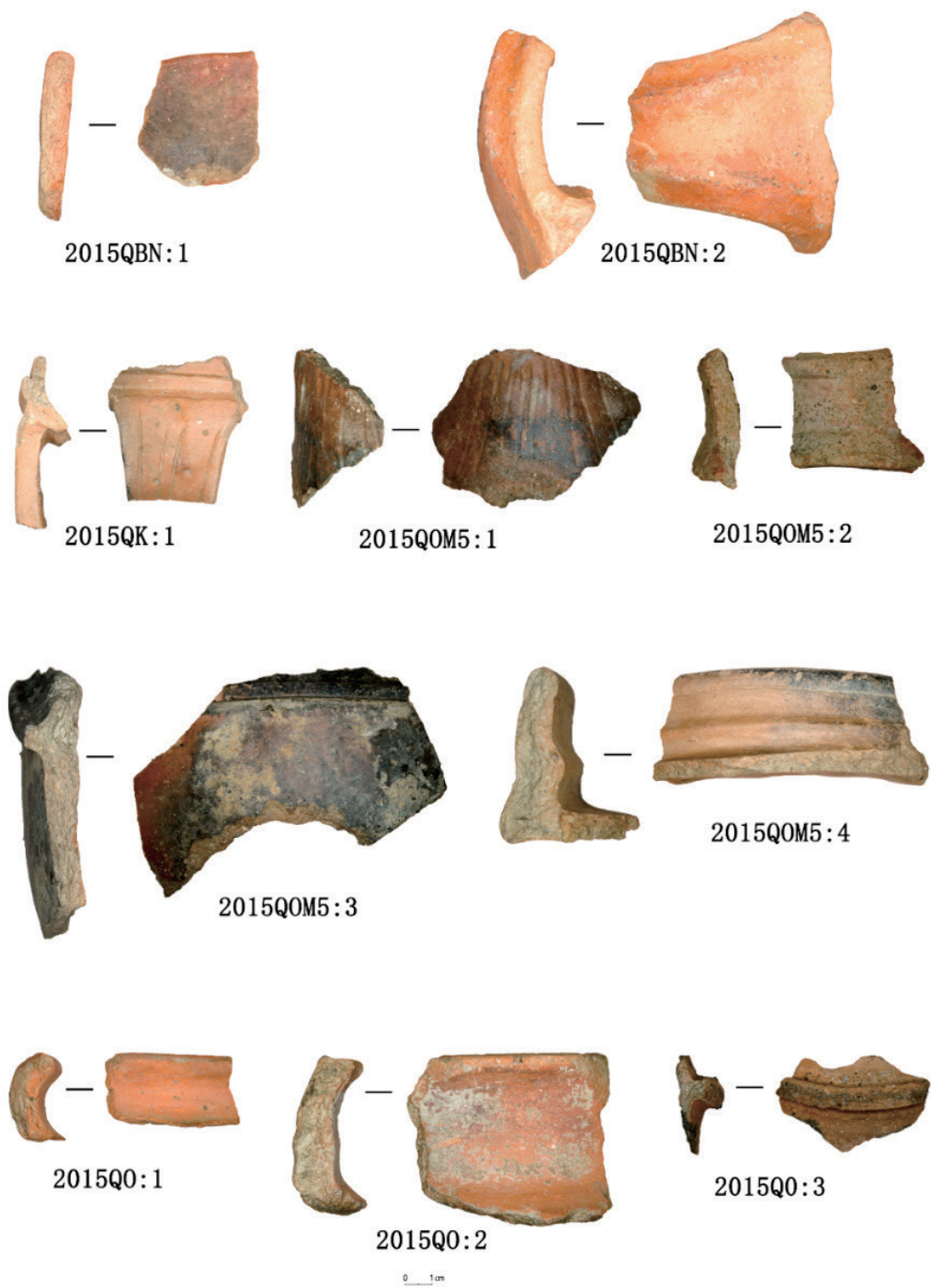
12 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76。

13 曲桑：《西藏原始文化古迹——多吉扎岩画》，《西藏民俗》，2002（2）：8。

14 张亚莎：《西藏的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45。



图一〇 新发现 3 处岩画 (1-5 邦嘎村南, 6 错杰村, 7-8 昆门村)



图一一 采集陶片标本

代可基本定在吐蕃时期，4个标本均为夹细砂红褐陶，两件可辨器型（① 2015QOM5:3 为钵，口沿下一圈凸棱，鼓腹，表面有黑色陶衣；② 2015QOM5:4 为敞口矮领罐，口沿下一圈凸棱。）。

此次调查采集陶片皆出自于非聚落遗址，其参考性较弱。采集的随机性加上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很难对陶片做进一步分析。

五、总结与展望

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琼结河流域史前遗址的分布状况，但因调查时间、区域及一些不可控因素的限制，调查还没有发现史前遗存。这次考古调查为西藏中部首次针对史前考古开展的专题调查，我们的工作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反思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一，“拉网式”调查方法可以有效发现新的考古遗存。本次工作的琼结河流域从 20 世纪 50 年代首先进行考古调查，到后来的三次文物普查（三普资料暂时还未公布），历经多年工作，但由于高原地区尤其是河谷地带的独特自然地理地貌特征，仍然留有进行再次调查工作的空间。此次吐蕃墓和岩画的新发现再次证明了“拉网式”调查在西藏重点考古区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我们认识到，琼结河谷这种深切高山宽谷地貌，使得“拉网式”调查必须考虑季节性的影响。2015 年度的工作因照顾邦嘎遗址的发掘，在夏季进行调查，青稞小麦的生长降低了调查的可视域、影响了调查的效果。秋季地表植被的影响可以大大降低，应是最好的调查工作时间。二，一般认为，“拉网式”调查方法与“专题性”调查方法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对调查区域内所有的遗存都进行调查¹⁵。在本次调查中，因为琼结河谷区域之前已进行过多次调查工作，已知遗存的情况都已经掌握，故本次调查首先关注之前没有发现的遗存情况，这部分资料对于细化西藏中部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大价值。从方法上看，是结合了“拉网式”与“专题性”调查的新方法。其次，本次调查重点关注于史前遗址与岩画遗存，以期为细化西藏中部史前文化序列、重建该区生业模式、了解该区域先民精神文化等研究寻找新材料。根据邦嘎遗址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通过对卫星图片的分析，确认了若干处具有类似条件的待调查点。2015 年度的调查工作只调查了这些待调查点中的一小部分，虽然尚未发现史前遗址，但具有类似分布特征的岩画的发现还是初步证明这种方法是具有可行性的。三，本次调查发现的石丘墓，系藏中地区首次发现。由于没有试掘，难以对其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此次新

15 朔知：《中国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辨析》，《中原文物》2010（4）：29-38。

发现的这批材料，结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拉林铁路调查中发现的泽当石棺葬，及山南地区文物局掌握的基建工程中发现的其他墓葬线索，及已知的这一地区类似香达墓地这样的封土墓，可以为研究吐蕃时期的墓葬制度及藏王陵的墓葬分布提供新的材料，值得关注¹⁶。

2015 年度的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受限于人力物力资源的不足及技术上的原因，调查成果与预期有一定差距。相信随着今后年度调查工作的继续推进，会有更多的发现。

调查：杨锋、吕红亮、唐莉、徐海伦、陈祖军、宋吉香、陈心舟、赵丹

摄影：杨锋、吕红亮、唐莉、陈祖军

绘图：徐海伦、唐莉

执笔：杨锋、唐莉、徐海伦

16 参见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58-62；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9）：9-19；夏吾卡先：《吐蕃王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48，57。

that this octagonal pillar was now housed in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s a bequest of the US sinologist Berthold Laufer.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is important pillar with its accession to the Field Museu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ang-Tibetan trade.

Tracing the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the Tubo Period in Tulan, Qinghai Province

Huo Chuan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The Tubo tombs in Tulan, Qinghai, are located in a large cemetery with a very wide distribution. The cemetery is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diverse found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it can be dated sometime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Most of the tombs were looted prior to the formal excavation by archaeologists.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are relatively rich in the Reshui Tomb No.1 and the four tombs on the south bank of Reshui ditch. However almost no findings were ever published. In the newly built museum in Tulan county, the first batch of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Tubo tombs that were obtained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in recent years are now exhibited. This paper adds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burial objects in terms of type, date, function and so on, which can be corroborated by previously excavated materials. It provides researchers with mor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 of Work Done in 2015 in the 'Phyongs rgyas River Valley in Lho kha, Tibet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TAR

Lhokha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TAR

(Yang Feng, Tang Li, Xu Hailun)

In July 2015, the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t Sichuan University formed a team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Phyongs rgyas river valley in Central Tibet. The previous census of Central Tibet's cultural heritage basically assessed the distribution of immovable cultural relics in this region, but the investigation was not systematic and no examples of plans designed for future research projects were developed. This time, the pull-net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find out the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Phyongs rgyas river valley. A number of tombs and petroglyphs

were found and systematic survey methods suitable for Central Tibet were explored, which will provide rich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archaeological surveys in the Yar lung river valley.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Tubo Dynasty Rock Sculptures in the Town of Sgar thog in Smar khams County, Tibet

Center of Tibet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Smar khams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Tourism Administration, TAR

(*Yang Qingfan, Lu Suwen, Zhang Yanqing*)

In 2014, Tshe ring rgyal po, a researcher of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TAR, discovered the rock sculptures of a Vairocana and eight Bodhisattvas and another rock carving in Smar khams county. Then in July 2016, the Center of Tibetan Studies,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of Sichuan University, Smar khams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on of TAR conducted a detailed field research. A new rock carving with Tibetan inscriptions and another rock sculpture of Vairocana were discovered besides the two that had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Based on the subject matter, artistic style and characters of the Tibetan inscriptions, these newly discovered rock sculptures might belong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reign of Khri srong lde btsan (755-798) and the reign of Khri lde srong btsan (798-815), that i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Along with the Tubo dynasty rock sculptures that had already been discovered in Smar khams, these Buddhist remains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between the Tubo and Tang dynasties, and have considerable value for the art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Faunal Remains from Dkar dung Site of Mnga' ris, West Tibet

Zhang Zhengwei, Lü Hongliang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In 2013, during the excavation in Dkar dung site,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one animal remains were collected. The NISP value is 110 and the MNI value is 28, with species identified as *Bos grunniens*, *Capra hircus*, *Ovis aries*. These three taxa are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the livestock that was raised by the early Dkar dung people. With pal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Dkar dung people may have practiced agropastoralism in and around the site.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the adjacent Gu ru gyam and Chu 'thag cemeteries shows a contemporaneous people who occupied those areas and probably practiced a more specialized pastoralism. We suggest that in western Tibet we encounter an